

汉语方言论集

王福堂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论集/王福堂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512-2

I. 汉… II. 王… III. 汉语方言—文集 IV. 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685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ANYU FANGYAN LUNJI

汉 语 方 言 论 集

王福堂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512-2

2010年4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0%

定价:44.00元

目 录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	1
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	9
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	19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	27
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	34
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	56
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	65
徽州方言的性质和归属·····	80
普通话 üan 韵母主要元音的音值·····	89
普通话语音标准中声韵调音值的几个问题·····	91
北京话儿化韵的产生过程·····	99
杭州方言上声字中声母 v、z 的音变·····	110
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	118
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	123
原始闽语构拟问题的研究过程·····	137
汉越语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中並定母读音的关系·····	144
壮侗语吸气音声母 ?b、?d 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149
广州方言韵母中长短元音和介音的问题·····	154
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的问题·····	174
方言本字考证说略·····	191
绍兴话记音·····	207
绍兴方言同音字汇·····	242
绍兴方言中的两种述语重叠方式及其语义解释·····	271
绍兴方言韵母又读中的元音 ɒ 和 a·····	280

绍兴方言中蟹摄一等哈泰韵的分合·····	292
绍兴方言百年来的语音变化·····	298
绍兴方言中表处所的助词“东*”、“带*”、“亨*”·····	310
从“实心馒头”到“淡面包”再到“淡包”·····	319
绍兴方言“修子”本字考·····	322
后记·····	326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

汉语方言中,下列现象可能和层次有关: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北京话陌韵字“伯” $\text{p}^{\text{h}}\text{o}$ 、 $\text{p}^{\text{h}}\text{ai}$ 、 $\text{p}^{\text{h}}\text{ai}$ 不同的韵母和声调;相同的意义有不同的词语,如“鼎”、“镬”、“锅”等;相同的语法功能有不同的句式,如疑问句的“vp 不 vp?”和“可 vp?”式;等等。以上各例分别属于语音层次、词汇层次和语法层次。这些层次大多由从异方言(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的其他方言)借入的部分和本方言原有的部分叠置而成。

本文讨论语音层次。语音层次具体表现为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一个字或一组字)在方言共时语音系统中有不同语音形式的若干音类。有的音类来自异方言,就叫做异源的。比如北京话上引陌韵字“伯”和下列铎韵字:

酪 lau^{h}

洛 luo^{h}

络 $\text{luo}^{\text{h}} \text{lau}^{\text{h}}$

同是陌韵字,韵母有 o、ai 两个语音形式;同是铎韵字,韵母有 o(uo)、au 两个语音形式。陌铎韵字韵母各有两个音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中 o(uo)是异源层次。

汉语方言中,一个字的异读中往往有异源的。这类异读具有不同的风格,并有语音上的对应性,一般称为文白异读。单个字的异读分别称为文读音(或读书音)和白读音(或口语音),如上述北京话铎韵“络”字的 luo^{h} 为文读音, lau^{h} 为白读音。多个字语音上有对应的异读形成异读层次,分别称为文读层和白读层,如上述北京话陌铎韵的 o/uo 属文读层,ai/au 属白读层。异源层次一般是其中的文读层,大多是从外方言借入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异读中都有异源层次。比如北京话“慨” $\text{k}^{\text{h}}\text{ai}^{\text{h}}$ 、 $\text{k}^{\text{h}}\text{ai}$ 两读只是本方言中字音的声调分化,不是另从异方言借入读音的结果。又如“离~开” li 、 li^{h}

两读也不是声调的异源层次,而只是同形字“离~𠂔”(力智切)和“离~𠂔”(吕支切)合并的结果。此外,许多语言运用造成的字音变化也不能归为异源层次。比如广州话“纠”^ㄅteu 是偏旁“𠂔”和“斗”混淆造成的误读,福州话“脚”^ㄅk^ha 是同义词“骹”的训读,这类读音和本字没有关系。

二

底层也是一种异源层次。这种层次比较古老,而且在语音系统中往往有特殊的曲折的表现。底层原是地理学名词,指最深处的地质层次,有时会有露头。语言学借用这一名词,用来指历史上已经被替换的语言留下的痕迹(大多表现为音值特点或个别词汇)。比如浙江庆元话帮端母为 ?b、?d,如“布” ?bu^ㄨ,“到” ?dau^ㄨ。帮端母浊化并吸气的这种特殊变化是汉语的历史演变所不能解释的。但大多数壮侗语声母塞音中双唇音和舌尖音只有浊音,其他部位只有清音,则是普遍的现象。联系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情况来考虑,庆元话双唇和舌尖部位塞音的特殊音值应该是反映了壮侗语的特点。这种音值是早期壮侗语和吴语接触后遗留下来的,目前在庆元话中成了体现壮侗语影响的底层。

有的方言底层的特殊语音形式已经消失,但通过它对语音系统造成的影响可以推知它早先曾经存在。比如湖南临武土话中古浊声母的音值:

婆 ^並	甜 ^定	球 ^群	贱 ^从	斜 ^邪	丈 ^澄	锄 ^崇	乘 ^船	仇 ^群
^ㄅ pu	^ㄅ tī	^ㄅ k ^h iou	^ㄅ tɕ ^h i ^ㄨ	^ㄅ tɕ ^h io	^ㄅ ts ^h aŋ	^ㄅ tɕ ^h ye	^ㄅ ts ^h en ^ㄨ	^ㄅ tɕ ^h iou

从例字中可见,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中並定母为 p、t,不送气,其他声母为 k^h、ts^h、tɕ^h 等,送气。这些送气和不送气的声母在音值上和一般汉语方言中同类的声母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送气不送气的分化原则却显得特殊,同样不是汉语的历史演变所能解释的。联系上面庆元话帮端母的表现,可以推知,临武土话古浊声母的这种特殊分化也是壮侗语双唇、舌尖部位吸气的浊塞音影响的结果。与庆元话不同的是,临武土话后来又受到古浊声母清化后一律送气的客赣方言的影响,有了特殊的演变:本来双唇、舌尖部位的吸气音变为不送气清音,非吸气的其他声母变为送气清音。从发音方法来看,吸气音是不可能演变成送气音的。並定母目前虽然已经不是吸气音,但它没有变为送气音,则是因为曾经是吸气音的缘故。因此,临武土话並定母的不送气也体现了壮侗语声母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表现比较曲折。

三

分析层次可以了解异方言及其语音特点,因而是一种必要。分析层次主要是对字音的不同语音形式进行分类,确定文读层和白读层。比如把前述北京话陌铎韵字的层次分为文读层的 o(uo)和白读层的 ai、au。

层次的区分要包括全部字音。不仅有两读的字要区分文白,只有一读的也要如此。比如上述北京话铎韵字“酪”lau[˥] 一读是白读,“洛”luo[˥] 一读是文读。有的字只有一个读音,但可以认为既是白读又是文读。比如山东荣成话:

盘 ɕp^han[˥] 文 ɕpan[˥] 白 伴办 pan[˥] 拔 ɕpa

荣成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分平仄一律不送气。平声字“盘”有文白两读,仄声字“伴办拔”虽然只有一读,但应该认为它们其实也有文白两读,只不过两读相同罢了。所以字音可以有文白两读,即文白异读,也可以只有一个白读或一个文读,还可以兼有文白两读但语音形式相同。

有的方言中字音的文白异读不止两个层次。多层异读往往关系复杂,并可能存在文白转化的现象。比如泉州话豪韵字的一部分文读白读:

文	白	
ɔ	o	暴桃告高
au	o	抱扫牢好
au	ɔ	袍
o	au	草老

au、ɔ、o 三个韵母每一个都可以出现在文读或白读的场合,这对确定它们的身份造成了困难。仅就上面前三组的情况来看,文读白读的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 au 只出现在文读场合,o 只出现在白读场合,显然 au 是文读,o 是白读。ɔ 同时出现在文白场合,则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介于 o、au 二者之间的现象,相对于韵母 o 是文读音,相对于韵母 au 是白读音。即它们是最早层次 o,次早层次 ɔ,最新层次 au。不过第四组的情况比较费解,因为它和第二组的情况正好相反,彼此矛盾。这第四组情况的出现,应该是方言中字音文白层次在长期使用中趋于杂乱的结果,由此造成了语感中文白区分的困难。

一般说字音中声韵调层次的配合是有规律的:和文读声母配合的韵母也是文读,和白读声母配合的韵母也是白读,等等。比如上海话“人”ɕnɿŋ[˥] 白 ɕzəŋ[˥] 文,日母三等字

声母白读是鼻音 n ，和它配合的韵母是白读的齐齿韵 $iŋ$ ；文读声母是与由官话借入的音类相对应的 z ，和它配合的韵母是由 $iŋ$ 转为开口呼的 $əŋ$ 。又如北京话铎韵字“薄” $ɕpau$ 白 $ɕpo$ 文，两读中韵母区分文白，声母不区分文白。但也可以看成声母文白读音的语音形式相同，所以仍然是白读的声母和白读的韵母配合，文读的声母和文读的韵母配合。

不过有的方言字音中声母韵母和文白层次的配合并不严格。比如厦门话“知” $ɕtsai$ 白 $ɕti$ 文 ti 文三个读音中，声母 t 是白读， ts 是文读，韵母 ai 是白读， i 是文读。但在配合中，“知”的前一个读音是声文韵白，后两个读音是声白韵文，声母韵母之间文白的配合不一致。这几个读音应该不是本方言原有的，而是异方言的音类借入后与本方言的音类配合的结果。比如借入的韵母 i 和本方言的声母 t 配合为 ti ，借入的声母 ts 和本方言的韵母 ai 配合为 $tsai$ 。这是因为本方言声母韵母有多个层次，而层次的区别在长期的使用中已经杂乱，所以异方言音类和本方言音类的配合在文白层次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厦门话的“知”应该曾经存在声母韵母和文白层次严格配合的读音，比如 tai 和 tsi ，但目前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现象说明，在有的方言中，不能认为方言字音中声母是白读的韵母一定也是白读，声母是文读的韵母一定也是文读，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四

语音层次有本方言原有的，有由异方言借入的，所以通常说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中可能存在异源或异质的成分。在语音层次中初步分清借自异方言的文读层和本方言原有的白读层以后，还需要了解其中异源层次的来源。异源层次的来源一般可以根据语音形式本身来判断。比如前述上海话“人” $n̩iŋ$ 白 $ɕzəŋ$ 文，根据日母字在吴方言口语词中声母为 $n̩$ ，在官话中声母大多为 z 或 $ʐ$ ，可以把声母 $n̩$ 确定为吴方言本身的层次，归入白读层，把 z 确定为来自官话的层次，归入文读层。

有的方言还可以借助文献材料来判断层次的来源。比如安徽休宁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分送气不送气两类，分化并没有语音条件。以定母字为例：

$te^{\supset}$ 题提蹄 $\neq$ $th^{\supset}e^{\supset}$ 啼

$to^{\supset}$ 弹 $\neq$ $th^{\supset}o^{\supset}$ 檀坛

$tiəu^{\supset}$ 投 $\neq$ $th^{\supset}iəu^{\supset}$ 头

$ti:ə^{\supset}$ 填 $\neq$ $th^{\supset}i:ə^{\supset}$ 田

to^o 堂棠唐塘 ≠ t^hto^o 糖

ta^o 腾誊 ≠ t^ha^o 藤

tæn^o 铜桐筒童瞳 ≠ t^hæn^o 同

各行不等号前后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属于同一小韵,原是同音字,而目前却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一个历史记载提供了这一声母分化的线索。根据清江永《榕村〈等韵辨疑〉正误》所记,三百年前婺源东郊方言和休宁话的古浊声母都是清化不送气的,西郊的方言直到饶州(今江西省赣方言区)都是清化送气的。清化送气体现了赣方言的特点。因此可以说,目前休宁话一部分古浊声母字清化送气应该是那时以来赣方言影响扩大的结果,属异源层次。

有的方言缺乏文献材料帮助判断层次的来源,可以借助和邻近方言的比较。比如建瓯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也分送气不送气两类,也没有语音条件可以说明。如下列並(奉)母字“肥”、“瓶”、“皮”和定(澄)母字“茶”、“铜”、“啼”,每一组第三字的送气声母,可以根据历史文献中唐以后中原移民经江西大量进入闽地的记载,判断是由客赣方言借入的。而前两字声母的不送气,似乎都反映了本方言原有的读音。但如果把建瓯话和邻近的建阳话、石陂话相比较,就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肥	瓶	皮	茶	铜	啼
建瓯	py ^o	^ɕ paɪŋ	p ^h yɛ ^o	ta ^o	^ɕ tɔŋ	t ^h i ^o
建阳	^ɕ py	^ɔ vaɪŋ	^ɕ p ^h u	^ɕ ta	^ɔ lɔŋ	^ɕ hie
石陂	py ^o	^ɕ beɪŋ	p ^h o ^o	ta ^o	^ɕ dəŋ	t ^h ie ^o

以上並定母两组古浊声母字中,建瓯话不送气的“肥”、“茶”二字,建阳话、石陂话也不送气,“瓶”、“铜”二字,则建阳话声母为浊擦音和边音,石陂话声母为浊塞音。“瓶”、“铜”二字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临近吴方言影响的反映,只是在三个方言中反映的程度有所不同,一保持为浊音,一已经弱化,一已经清化。由此推断,建瓯话古浊声母的不送气音来源并不单一,“肥”、“茶”的声母固然为闽方言原有,“瓶”、“铜”的声母却来自吴方言。

五

如前所述,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原有的音类构成叠置。但方言中还有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

首先,这后一种音类叠置主要和“词汇扩散”式的音变有关。比如目前北京话零声母 uei 韵母阳平字向阴平调的演变,采取一部分字一部分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离散式音变。如①围为桅②唯惟维违③危微微巍等字,其中①还没有变化,仍读阳平调,②已经开始变化,读阴平调阳平调两可,③已经完成变化,只读阴平调,不再读阳平调。这种方式的演变将会使所有的 uei 韵母阳平字都变成阴平字。不过这种音变也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即个别还没有变化的字音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进入变化的行列,最终作为旧音类的残余遗留下来,和已经变化了的新音类构成叠置。其次,个别字音如果和字形分离,语音上也可能会脱离音类主流的变化而成为残余形式。比如闽方言中效摄开口三等韵目前主要的语音形式是齐齿韵,但干燥义的“焦”字在福州话、厦门话中读音为 ζta ,韵母为开口韵 a(另“猫”字也为 a 韵母,如福州话 ζma ,厦门话 ζba 。但根据建瓯话该字的读音 me^2 ,应该认为是一个二等字,不属三等)。《说文》:“焦,火伤也”,原指物因火变质变色。但在“焦”义转为干燥后, ζta 音就和字形分离开来,人们一般都用同义词“干”作为书写形式。于是这个不再被认为是“焦”的字音 ζta 就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残存形式,和效摄开口三等字齐齿韵的主流语音形式构成叠置。第三,个别字音的特殊变化也有可能生成新的语音形式。比如北京话“谁” $\zeta \text{ŋuei}$ 在 20 世纪产生新的读音 ζsei 以后,两个韵母也构成了叠置。以上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和因借入异方言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形式上是一样的。这样看来,如果说因异方言音类进入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叫做层次,那么因为方言自身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也可以叫做层次。由于后者两个语音形式反映的是同源音类的历时差异,可以把它叫做同源层次,和异源层次相对。

六

异源层次和同源层次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内部的音类一属异质,一属同质。但由于它们在语音形式上可以相同,区分存在困难。这就需要考虑使用语音的和非语音的多种手段。

首先从语音上考虑。同源层次中的新音类是旧音类演变的结果,而演变应该是可以用音理来说明的。这里把语音变化的过程看成是一个环环相接的链,那么旧的语音形式总是这个音链的上环,新的语音形式总是音链的下环,二者的位置不会倒置。比如北京话“嫩”的两读 $nu\grave{a}n^2 \sim n\grave{a}n^2$, $nu\grave{a}n^2$ 是旧的语音形式,其中的介音 u 由于舌位偏前的声母和韵尾的共同影响而失落,变成了新的语音形式 $n\grave{a}n^2$ 。就北京话

来说,不能反过来假设 $nuən^2$ 是由 $nən^2$ 变成的,因为说 $nən^2$ 衍生出一个介音 u 是没有任何音理上的根据的。(不过有的方言如厦门话,中古开口字“尘” $t^hən$ 却在同一语音条件下由开口韵转为合口韵,说明汉语方言中的语音变化不都是由同一发音机制决定的。)

但在异源层次中,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原有的音类彼此间没有演变和生成的关系,因此它们中哪一个是音链中的上环和下环,要根据两个方言中该音类演变的速度来决定。如果异方言演变快,则本方言音类是音链中的上环,异方言音类是下环;如果本方言演变快,则异方言音类是音链中的上环,本方言音类是下环。前者如上海话奉母字“肥” $bi_{白} \quad vi_{文}$,本方言的白读音声母为双唇音 b ,由官话借入的音类折合成的是唇齿音 v ,唇齿音是由双唇音演变来的,所以白读音是音链中的上环,文读音是下环。后者如双峰话溪母字“口” $te^{h}ie_{白} \quad k^he_{文}$,流摄开口一等韵声母在官话中是舌根音,而本方言中因为韵母中前元音的影响而由早先的舌根音腭化成了舌面前音,所以文读音是音链中的上环,白读音是下环。上面说过,同源层次中旧的语音形式总是演变慢的一方,因此,凡音类演变快的异源层次都不难和它相区别。但音类演变慢的异源层次则可能难以和同源层次相区别,因为本方言的旧语音形式和异方言音类都是音链中的上环,情况相似。这就需要寻求除语音以外的其他条件来帮助区分两种层次。下面以苏州话歌韵字为例:

∂u	驼搓歌
∂	他哪那
$\partial u_{文} \quad \partial_{白}$	多拖
$\partial u_{文} \quad i_{白}$	左
$\partial_{文} \quad \partial u_{白}$	大

韵母中共有 ∂u 、 i 、 ∂ 三个语音形式,但文白的配合并不单纯。 i 只见于白读音。 ∂u 有时单独出现,有时是与 ∂ 或 i 交替的文读音,有时是与 ∂ 交替的白读音,看来也像是一个被新文读音推挤的旧文读音。即三个语音形式是白读音 i ,旧文读音 ∂u ,新文读音 ∂ 。但韵母同样为 ∂ 的“多”、“拖”和“大”则文白情况相反,成为矛盾。从词语来看, ∂ 韵母实际上应当分为两类:“多~呢”、“拖~箱子”的读音是口语中旧有的白读音,“大伟~”和“他哪那”等的读音本地口语不用,只见于书面语,应为新起的文读音。 ∂ 韵母的这种或文或白并不是其他韵母推挤的结果,而是借入异方言的字音造成的。这样,歌韵字的三个语音形式就应当分成四个层次: ∂u 、 i 、 $\partial_{白}$ 、 $\partial_{文}$ 。就苏州话歌韵字中古以后的历史演变来看,韵母曾经历过一个高化的过程,其中 ∂u 是这一演变的

结果,白读音 σ 是旧语音形式的残留,白读音 i 是原读 σ 韵母的某些字后来衍生出 i 介音再变化的结果,文读音 σ 则是由官话借入的。这样, $\sigma_{\text{白}}$ 、 i 、 σu 应该属于同源层次, $\sigma_{\text{文}}$ 属于异源层次。其中 $\sigma_{\text{白}}$ 和 $\sigma_{\text{文}}$ ($\sigma_{\text{文}}$ 在官话中其实也是旧语音形式的残余)语音形式相同,但由于文白的差异,得到了区分。综上所述,苏州话歌韵字的层次应该是: $\sigma_{\text{白}1}$ 、 $i_{\text{白}1-2}$ 、 $\sigma u_{\text{白}2}$ 、 $\sigma_{\text{文}}$ 。

汉语方言中层次形成的时间早晚不尽相同。就总体情况来看,官话是汉语方言中去古最远的,所以官话在近代、现代对东南诸方言影响造成的异源层次,容易和这些方言中的同源层次相区别。而东南诸方言相对来说存古较多,相互间的影响也发生较早,因而不少方言,特别是闽方言中层次多而复杂。在这些方言中,如果两种层次和文白的联系不够清晰,判断相互间的区别将是更为困难的。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李如龙:《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商务印书馆,1992。
 王士元:《语言的探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

(原载《语言学论丛》第27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

汉语方言字音存在文白异读,其中口语音是方言原有的,读书音借自异方言。这一看法目前已经成为共识。不过由于方言的复杂性,对极少数语言事实还存在不同的解释。本文在这里讨论与读书音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读书音的来源

文白异读中的读书音来自异方言。但异方言具体情况有不同。因异方言情况的不同,读书音可以分别叙述如下。

1. 来自权威方言的读书音

作为读书音来源的异方言,一般指权威方言。而权威方言有时也是汉语的民族共同语。就文献所见,宋元以来,在汉民族共同语形成过程中发生过影响的汉语方言,先后有宋元时河北中南部和山东一带的方言,明代和清初南京一带的方言,清中叶以后北京一带的方言。它们都属于官话方言,语音系统相近,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判断目前方言中的读书音反映的是其中的哪一个。比如扬州话:

街 $\text{c} \text{tɕiɛ}$ 文 $\text{c} \text{ke}$ 白

“街”,见母开口二等字。见系二等字声母的腭化最早发生在官话区北层的大多数方言,普遍见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要借助汉语历史研究才能确定这一读书音语音基础的所在地。又如广州话:

近 kən^2 文 ${}^6 \text{k}^h \text{ən}$ 白

“近”,全浊上字。读书音的阳去调反映了普遍见于官话方言区的全浊上归去(阳去)的调类演变规律。要弄清楚“近”的读书音来自哪里,也要借助汉语的历史研究。

权威方言有时不是民族共同语,而只是邻近的某个比较有影响的方言。以浙江金华话的咸山摄字为例:

三 $\text{c} \text{sā}$ 文 $\text{c} \text{sa}$ 白 仙 $\text{c} \text{sia}$ 文 $\text{c} \text{sie}$ 白 酸 $\text{c} \text{suā}$ 文 $\text{c} \text{sy}$ 白 宣 $\text{c} \text{eyā}$ 文 $\text{c} \text{ey}$ 白

例字中口语音为纯元音韵,读书音为鼻化韵。口语音的纯元音韵是由方言早期的鼻

尾韵弱化变来的。读书音的鼻化韵则来自较晚的鼻尾韵,显然与后来的异方言影响有关。金华历史上一直是府治所在。南宋以后杭州一带北来移民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杭州话的吴方言面貌。以后杭州地区的居民不断南下进入金华地区,杭州一带移民的方言又影响了金华地区的方言,生成了丰富的读书音,并在这一方言分歧严重的地区发挥某种共同语的作用。这种读书音后来还成了地方戏曲婺剧的语音标准。

2. 北京话读书音的来源

在读书音来自异方言的问题上,北京话似乎有点特殊。李荣曾经认为:“北京话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北京话事实上的确有“从外地借来的”口语音。比如“芥菜” $kai^2 \quad ts^{h'ai}^2$ (某一品种的芥菜)一词的读音是从南方方言借入的,词中“芥”作为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没有腭化。而北京话原有“芥”的读音 $teie^2$, 声母已经腭化。已经腭化的读音应当看成是读书音,没有腭化的读音应当看成是口语音。又如地名“香港” $\zeta eiaŋ \quad \zeta kaŋ$, 其中的“港”也是见系开口二等字。据威妥玛《语言自述集》,19世纪中叶的北京话中,“港”字音 $\zeta teiaŋ$, 声母已经腭化。目前“港”字声母不腭化的读音应该和粤方言有关。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民情沸腾,这一地名不断见于国人的言语之中,名从主人,“港”字的读音就由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没有腭化的粤方言借入到北京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北京话中“港”的具有口语音性质的外来读音 $\zeta kaŋ$ 保存了下来,原有的具有读书音性质的 $\zeta teiaŋ$ 反而消失了。不过以上只是个别词语的情况。如果从语音系统着眼,认为北京话的读书音是方言原有的,口语音是借来的,北京话就成了读书音来源问题上的例外。而且这里还有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具有民族共同语地位的北京话为什么也要向异方言借入系统的字音。不过实际情况是,北京话成为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晚在清中叶以后,在这以前,北京话自然也要受那时权威的异方言的影响,借入字音。而借入的字音也仍然是读书音,不是口语音。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还说明,北京话的读书音是分期分批借入的。

目前北京话的文白异读,主要表现在铎药觉屋陌麦德职缉质韵入声字的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对应情况如下:

(1) 韵母

铎药觉 $o \quad uo \quad \gamma \quad ye$ (文)—— $au \quad iau$ (白), 例如:

薄 ζpo 文 ζpau 白 络 luo^2 文 lau^2 白 阁 $\zeta k\gamma$ 文 ζkau 白 学 ζeye 文 $\zeta eiau$ 白

屋 $u \quad y$ (文)—— $ou \quad iou$ (白), 例如:

熟 ζsu 文 ζsou 白 宿 su^3 文 ζey 文 $eiou^3$ 白

陌 o 文(文)—— ai (白), 例如:

迫 $p^h o^3$ 文 $\zeta p^h ai$ 白 择 ζtsy 文 $\zeta t\dot{s}ai$ 白 册 $ts^h y^3$ 文 $\zeta t\dot{s}^h ai$ 白

德 $\dot{y}$ 文(文)—— $ai ei$ (白), 例如:

得 ζty 文 ζtei 白 塞 sy^3 文 ζsai 白 ζsei 白 侧 $ts^h y^3$ 文 $\zeta t\dot{s}ai$ 白

缉 $\dot{y}$ 文(文)—— $ei \dot{\imath}$ (白), 例如:

涩 sy^3 文 ζsei 白 瑟 sy^3 文 虱 $\zeta \dot{s}l$ 白

(2) 声调

北京话古入声字的声调分派,是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清入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清入字的调类分派没有语音条件,而且不同的记载也不完全一致。近日高晓虹以《汉语方音字汇》为主对清入字进行统计,311字中,一字一调的字数为阴平 75(占 24.1%)、阳平 40(占 12.9%)、上声 24(占 7.7%)、去声 71(占 22.9%),一字数调的字数为 101(占 32.4%)。清入字的调类分派虽然缺乏条件,但按韵母的文白异读来判断,口语音多为阴平和上声,读书音多为去声和阳平。

(3) 声母

北京话知庄组字声母大多为 $t\dot{s}$ $t\dot{s}^h$ $\dot{s}$,但读书音有少数字的声母为 ts ts^h s 。如:

择 ζtsy 文 $\zeta t\dot{s}ai$ 白 册 $ts^h y^3$ 文 $\zeta t\dot{s}^h ai$ 白 色 sy^3 文 $\dot{s}y^3$ 白 ζsai 白

以上声韵调文白异读的情况,韵母方面,北京话古入声字口语音的韵母普遍见于北京所在的河北地区,显见是本地方言原有的读音。这些口语音韵母也见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说明它们早在元代已经存在。但读书音的韵母见于《中原音韵》的只有铎药觉屋韵字。这应该是从当时相邻的河北中南部和山东一带的方言借入的。和这类韵母元音音值相近的字音现在仍然能在这一带的方言里见到。如济南话:

薄 $\zeta p\dot{y}$ 络 $lu\dot{y}^3$ 阁 $\zeta k\dot{y}$ 学 ζey

熟 ζsu 宿 ζey

陌麦德职缉质韵字的读书音韵母则不见于《中原音韵》,而见于较晚明徐孝《合并字学集韵》。它们应该是稍晚在明代从当时权威的南京一带的方言借进来的。目前扬州、南京一带的方言也还有这种韵母元音音值相近的字音。如南京话:

陌 $m\dot{a}p_3$ 择 $t\dot{s}a\dot{p}_3$ 册 $ts^h\dot{a}p_3$

得 $t\dot{a}p_3$ 塞 $s\dot{a}p_3$ 侧 $ts^h\dot{a}p_3$

涩 $s\dot{a}p_3$ 瑟 $s\dot{a}p_3$ 虱 $s\dot{a}p_3$

声母方面,《中原音韵》中知庄章组相同而与精组对立,即知庄章组声母卷舌,精

组声母不卷舌。而目前南京一带方言知庄组梗摄二等字和庄组深臻曾摄三等字与精组相同,声母不卷舌,其他韵摄字和章组相同,声母卷舌。如南京话:

择 tsəʔ₅ 册 ts^həʔ₅ 涩 səʔ₅ 瑟 səʔ₅ 色 səʔ₅

闸 tʂaʔ₅ 察 tʂ^haʔ₅ 叔 ʂuʔ₅

北京话读书音的情况不同于《中原音韵》,而和上述南京一带的方言基本相同。这也说明北京话知庄组声母不卷舌的读书音主要是明代以后从南京一带的方言借入的。(早期北京话知庄组声母也有个别卷舌的读书音,如前例中的“色”ʂɿ²,则应当并非来自南京一带的方言。)

声调方面,《中原音韵》中上述清入字的声调为上声。而目前官话方言区清入字的调类东北地区归上声,北方官话归阴平。推测当时北京地区的方言因为和东北相邻地区的方言关系密切,声调分派规律相同,所以清入字也归上声;但又受到南部河北山东一带方言的影响,所以也有一些字归入阴平。明代以后,南京一带的方言开始在声调方面影响北京话。南京一带的方言有人声,入声的调型和去声的调型相近而略短(比如南京话目前入声调值为55,去声调值为44,都是高的平调),这可能使北京地区方言部分清入字的声调由上声或阴平转为去声。清代与民初北京话的读书音中曾有一种杜撰的入声调,在1920年王璞录制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中,调值就是与去声(高降调)相同而略短的。此外,北京话清入字还有一部分读阳平,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有人认为可能是全浊入归阳平这一调类分派规律影响的结果。因为归入阳平的全浊入字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送气,而归入阳平的清入字的塞音塞擦音声母也多为不送气。总起来说,北京话清入字是接受了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影响陆续派入多个调类,各次分派的语音条件混合在一起无法区分,造成了目前声调分派缺乏规律的现象。

上述北京话在成为权威方言以前借入异方言的过程说明,北京话成系统的文白异读仍然是读书音来自异方言,口语音是方言原有的,情况不是例外。

3. 来自文献规范的读书音

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以闽方言最为丰富。比如:

厦门 前 ɕtsien 文 ɕtsiŋ 白 ɕtsun 白 ɕtsāi 白

潮州 老 ɕlau 文 ɕlau 白 lau² 白 ɕliəu 白

福州 拖 ɕt^hɔ 文 ɕt^hua 白 ɕt^hai 白

闽方言的文白异读不但数量多,对应也复杂,其中还有语音形式比口语音古老的读书音。比如厦门话:

咸摄	馅 ham ³ 文 ā ³ 白	甲 kap ³ 文 ka ³ 白
山摄	单 ^c tan 文 ^c tūā 白	发 huat ³ 文 pu ³ 白
宕摄	娘 ^c liəŋ 文 ^c nīū 白	药 iək ³ 文 io ³ 白
江摄	腔 ^c k ^h ɔŋ 文 ^c k ^h iū 白	学 hak ² 文 o ³ 白
梗摄	行 ^c hiŋ 文 ^c kīā 白	摘 tɪk ³ 文 tia ³ 白

例字中口语音的韵母,舒声为鼻化韵,入声为喉塞尾韵。这种韵母是方言早期字音中韵尾-m、-n、-ŋ 和-p、-t、-k 的弱化造成的,而弱化作用与早期字音中韵母元音为低元音有关(类似现象在目前许多汉语方言中都有表现,如前述金华话咸山摄阳声韵字)。但读书音的韵母仍然保持韵尾-m、-n、-ŋ 和-p、-t、-k。这种语音形式比口语音古老的读书音,似乎与早期相邻的客赣方言对闽方言的影响有关。这种较后进入闽地的字音会较晚发生韵尾弱化的现象。不过就方言间的关系来看,客赣方言系统地影响闽方言的可能性不大。实际存在的也许是另一种可能性,即从社会文化情况考虑,宋元以来闽方言区普遍的识字教育会造成这样的读书音。和其他地区一样,闽方言区的儿童启蒙时要在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复杂的方言使人们特别注意字音。学习中,解释经书用口语音(厦门话就叫“解说”),诵读经书则用读书音(厦门话就叫“孔子白”)。这种读书音参照隋唐以来《切韵》、《广韵》等韵书的反切,与韵书字音的声韵相近,与口语音有不同,其中有些字音与变化了的口语音相比更为古老。随着时光的变迁,这种读书音通过塾师的世代相授流传下来,成为方言音系的组成部分。它的来源固然不是当时的某个异方言,但就其外来的性质和生成读书音的作用而言,古代韵书的语音系统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权威的异方言。

4. 关于读书音在共同语中与口语音并存的问题

李新魁曾在《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文中说,民族共同语可能同时存在书面语和口语两种标准音。他以明陶宗仪《说郛》中有关北宋时讨论“正音”的一则记载为例说明。《说郛》引《谈选》说:“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李文认为寇、丁其实并没有相互否定,而只是各主张一方面的标准。因为汉语共同语一直存在两种标准音,“一种是书面共同语的标准音,一种是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书面语的标准音就是历代相传的读书音,这种读书音在南北朝以至唐代,大体上就是《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读音系统,……而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河洛语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但宋以后共同语的两种标准音在中州音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清中叶以后又转为北京话。)也就是说,李文认为隋唐宋